

汗与酒

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汗”。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汗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姐姐就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家里的竹床，红彤彤的，就是被父亲的汗渍印的。母亲说父亲身体虚，三十多岁时，不管是睡在席子还是床单上，早上起来，上面都现出一个人形，是被虚汗潮透的。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父亲不喜欢低度酒，喝的多为度数极高的老白干（高粱酒），度数越高越解馋。医生让他不要再喝白酒，说喝点啤酒可以。父亲说，啤酒是马尿，根本不能喝！每每买来酒，他都要倒出一些用火柴试试，看能不能点燃，看到杯中的蓝色火苗冒起，就忍不住夸赞：“好酒！”有时客人到访，他给客人倒茶，自己往往以酒代茶。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

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父亲有一方著名的印章，叫“往往醉后”，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

父亲的画桌就是一块大木板，不是什么八尺九尺的大画桌。他一进入画室，状态立马不同，变得很怡然，很放松。父亲总是说，画画心要空。我的理解是，心不空就不可能心骛八极，发挥想象。如果今天要画画，早上起来就要喝酒，不画画就喝茶，写文章时就抽烟，有时画画也抽烟。除了在照相馆照相，父亲几乎所有的照片里没有一张手上不夹着香烟的。父亲的烟瘾同样有名，他有时会开玩笑说：“抽‘红双喜’像吃肉，抽‘农家乐’像吃草。”

父亲不做饭菜，也不洗碗筷，但是他的砚台、笔都是亲自洗的。父亲总是说，毛笔是要养的，如果不养，毛笔只有一天的寿命。父亲洗笔时连笔根都会洗干净，然后再挂起来，把水滴干；砚台也是同样洗得干干净净的。有的画家说，越脏的砚台画的画越好，上面积了多年宿墨，用时只要倒上一点茶水接着画。这是个人习惯，从墨趣上讲，则是歪理。

一个人最幸运的事有三样：一是有个好父亲，一是有个好老师，一是有个好朋友。父亲对你负责，老师为你释疑解惑，朋友则是知己。父亲虽然和我相处不到二十年，但我觉得人生这最幸运的三样事，父亲都给了我。

我小时候生了场大病，输了六瓶血才从死亡线上回来。病好以后，我的舌根就一直很痒，父亲经常要我伸出舌头给他看，直至最后和父亲分手的那天晚上，父亲还让我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看好些没有。

“非雅利安”女厨

1943年新年前夕，我回到柏林，打算和格尔达完婚。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进入尾声，我却迎来了人生的快乐时刻。

总理府各部门送了我们40瓶酒作为贺礼，这些都是膳食总管费希纳精心挑选的名酒。已届76岁高龄的费希纳是一位著名品酒师，曾给普鲁士国王吉约姆二世挑过酒。为了祝贺我的新婚，他亲自去了位于波茨坦的帝国总理府酒窖和储藏室寻找好酒，其中有7瓶是1921年生产的。他还告诉我，“这可是稀世珍品。”伴随着礼品，有一张小卡片，希特勒亲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良好祝愿”。签名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是一名素食者，但他有时会不遵守自己制定的营养规则，我亲眼见到过他大吃猪肉。有“老人”透露，不久前，他还主张不时吃一只上等家禽。只是在后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才完全不吃肉。在餐桌上，他有时还会遵循某些特殊的疗法，例如，我曾看到他吃高粱，而同桌客人却在分享炒土豆。

当我加入突击队时，希特勒的贴身女厨叫沙尔费特塞尔夫夫人，她总是根据总管凯恩伯格的指示做菜。有一天，很可能是1943年春，凯恩伯格“炒”了她。总理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向他告状，说他们发现沙尔费特塞尔夫夫人经常从食堂里偷食物。这一时期，大家越来越关注食品定量，谈话的主题常常围绕着食品的定量配给以及随之而来的缩食。我也一样，有时会小心谨慎地从大生菜盆里偷几片用冰块保鲜的黄油。“炒”掉沙尔费特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中当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塞尔夫夫人后不久，希特勒决定自己每顿只吃两小块黄油。

不久，冯·爱克斯纳夫人上了灶台，这位女厨师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聘请她来是为了替希特勒做素菜。仅仅几个月后，她又得脱下围裙。警察机构发现，她有一位犹太祖母，因此不“符合”正在执行的雅利安规则。总之，我们中间是这么流传的。

我知道，我来总理府的几个月，同样也受到德意志保卫部安全机构的审查，至少在

蒋凌霄一家

蒋凌霄觉得她一生中做出的最英明决定就是毅然把儿子蓝大伟送到新西兰去读书。

说实话，儿子蓝大伟大多数时候还是个挺不错的孩子，他健康阳光。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晚上回到家里一进门先响响亮亮地高声喊着，妈，我回来了！然后就卸下沉重的书包嚷着，妈，快点，我渴死了。等蒋凌霄递上水，蓝大伟就抱着水罐咕嘟咕嘟地喝上一大通，喝完水，蓝大伟就满世界地找东西吃，然后再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跟在蒋凌霄的身后给她讲每天学校发生的种种有趣的事情。到了饭桌上，蓝大伟一边吃着饭一边跟父亲蓝大伟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欧洲联赛、西甲联赛和英超联赛，谈NBA，有时还跟父亲一起预测本期足彩的结果。闲时，蓝大伟还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上包着彩色的方巾，戴着耳麦一边扭着胯一边听着欧美的摇滚乐。十八岁的蓝大伟单纯、时尚，没有一点恶习。

但这并不是说蓝大伟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蓝大伟有一个致命的硬伤，那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蓝大伟属于那种学习态度好，但成绩始终上不来的一种学生。特别是进入高三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就要高考了，蒋凌霄为他的成绩真的快急白了头，给他请家教给他培优不知花了多少钱。不管是培优也好请家教也好，不管风吹浪打点灯熬油蓝大伟从来都没有怨言。蒋凌霄让他上哪儿去学他就去哪儿，可是学回来了该不懂的还是不懂，一样的问题当时

都市小说

冯慧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择手段地施加在孩子身上，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痛苦就会随时袭来，并引发悲剧。蒋凌霄一家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供养儿子出国的高额费用而破产的蒋凌霄在她居住的城市里，见到靠她的血汗钱过着富足生活的儿子蓝大伟时，她的精神世界霎时崩溃了。

搞清楚，换个地方就又不清楚了。

蓝大伟的老师曾明确地告诉蒋凌霄，以蓝大伟目前的学习成绩上大学很有点悬。把蒋凌霄的圆脸都气成椭圆形了，她儿子怎么这样不争气，很长时间看着蓝大伟都没有笑脸。本来幸福和睦的家庭一夜之间蒙上了阴霾。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紧张极了，蓝大伟的话很少，除了家时不再响响地喊妈了。而是一回来就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时低着头

匆匆地扒两口饭就又进屋了。丈夫蓝天祥有些不忍心地悄悄对蒋凌霄说，算了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别把孩子逼傻了。蒋凌霄气恼地说，你说的什么话呀，难道他智商有问题？要是智商出问题也是你们家遗传的。我们家三代出了五个大学生，你们家最好也就是个大专。女人就是这样，跟丈夫生起气来就要横蛮不讲理的。蓝天祥连忙说，好好，随我好不好，我的智商有问题行了吧！你别逼我儿子了。

蒋凌霄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你以为我愿意这样逼他？他要是一个女孩子我早就算了，以后可以找个好人家嫁了，靠着老公吃饭。可他是一个男孩子呀，这个社会竞争这样激烈，他没有文凭以后怎样成家立业！我是为他的前途着急呀！自从蓝大伟上了高三，这个家就笼罩着沉重的气氛。

蒋凌霄在一家企业做统计员，统计室是女人扎堆的地方，大凡女人多的地方是非也多。女人在一起比较关心的是谁家老公会赚钱，谁的衣服有档次，谁的孩子学习好。除了孩子学习这一条，其他的蒋凌霄都挺优越的。她的丈夫原是电信局的一个工程师，几年前出来自己做，开了一个手机店。前些年手机的生意好做，赚了一些钱先买了房后又买了车，生活自然比一般人好些。蒋凌霄在统计室做了这么多年也算老资格了，去年还评上了中级职称。平时在单位里年轻人都喊她蒋姐蒋姐的挺尊重她的，工作也还顺心，除了儿子的事让蒋凌霄闹心以外，蒋凌霄应该是活得很滋润的一个女人。

狗子的媳妇桃花

窑门口闯进一个高大粗壮的妇女来，一手提着个包袱，一手拉着个孩子，在她身后跟过来的人围了足有一大片。村长一眼就看清楚了，这女人是狗子的媳妇！那小孩自然是狗子的儿子了。

张书记一看那女人的架势神态，就知道一准是来找事的，他正想着该说点什么，不防那女人眼睛一眨，眼泪就哗地流了出来，连哭带喊地叫嚷起来。不过那女人并不歇他，一眼就只瞅着王副县长：“哎呀！总算找着了啦！县长同志你正好在呀！哎呀！县长同志你可得为我做主呀！哇……”那女人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哭声震耳，整个窑洞里都是一片嗡嗡声。那小孩见母亲这样，顿时也哇哇大哭起来。

好一阵子，窑洞里所有的人都只是眼巴巴地瞅着这娘儿俩看，全都显出茫然无措的样子。也不知过了多久，村长才慌忙凑过去小声对愣着的书记说道：“这就是护林员狗子的老婆。”

那女人瘫成一团跪在那儿，一边哭，一边嚷：“县长同志你一定得给我这娘儿俩做主哩呀！我们刚才在医院里，人家大夫说了，我那一口子是没指望啦，说让我准备后事哩呀！你说说，这到底是该咋办哩！”

“起来！”王县长终于发了火，“你到这儿是哭来了还是闹事来了！”

那女人愣了一愣，哭声戛然而止，连小孩也痴痴地瞅着县长突然没了哭声。沉默了一阵子，等外头的吵吵声也渐渐静下来，书记便问：“你叫啥？”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残疾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我叫桃花。”桃花赶忙答道，一边又用袖子在脸上擦了两把。

“你知道不知道晚上的事情？”书记的口吻有些阴沉。

“……知道啦。”桃花在书记脸上瞅了又瞅。

“既然你也知道你丈夫都干了什么事了，却还要让领导给你做主！”县长依然一脸的怒气，“你男人一下子杀了这村里四个人！你懂不懂，杀人犯！”

“哦，原来是这样，杀人

我‘试用’的4个月里。这一时期后，我得守口如瓶。我知道，我们的邮件受到监控。一天，德意志保卫部的一名成员拿着一封信来找我，他问我为什么老是收到同样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女性朋友写给我的，我和她在巴伐利亚一个治疗中心相识，此后我们便保持鸿雁往来。她嫁给了一名警长，后来她丈夫调到杜塞尔多夫。显然，她不假思索地使用了丈夫工作单位的信封，人们认出了她丈夫单位的邮戳，所以感到很惊讶。

“保罗大叔”被盖世太保逮捕的那一天，我正在柏林。他们将他送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了起来，他的朋友立即去找我太太格尔夫达，告诉她“保罗大叔”被捕的情况。我太太毫不迟疑地打电话给我，我马上明白我应该找谁。我火速赶到卡尔·沃尔夫的办公室，他是希姆莱的左右手。那天，他正好在，我劈头盖脸地对他说，几小时前被他手下逮捕的人是我的一位近亲，实际上算是家族成员，他与任何反对党或组织都没有瓜葛。我还明确表示，他确实曾加入过社民党，但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可以发誓。”我对他说。在我离开房间前，沃尔夫只向我承诺，他将过问此事。

一星期后，“保罗大叔”获释了。回家后，他和太太向我表达谢意。我问他他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关押的情况。他说，在他看来，最糟糕、最不愉快的事情，是人们给犯人的衬衣像纸一样薄，其余的他没说什么，至少对我什么也没说。

我认为自己从未被怀疑过。总之，我没有担心过，任何时候都没有担心过。

犯！”桃花像终于明白了似的，嗓音陡然间也硬气起来，“敢情是这样么来着，你们就这么看他，杀人犯！”桃花猛地又用袖子蹭了一把脸，一下子就蹭出一脸的强横愤怒来。

“我原想着你们才不会这么说他，他是你们公家的人，他是为了你们才遭了这么多罪哇！”桃花一脸压不住的愤恨，“你们是憨子还是傻子，你们是瞎啦还是聋啦！你们到山上瞅瞅去，你们到别处听听去！他在山上遭了这几个月罪都是为的啥！还不是为了那一山的木头！还不是为了公家！还不是为了你们公家这些人！我真不晓得你们就这么看他！杀人犯！”说到这里，桃花的嗓音打起颤来，她恶狠狠地擦了一把眼睛，一甩头又把脸仰了起来，满眼的泪水依然止不住地往外涌。

“你们说我不该到这儿来，你们咋有脸这么说！这些日子，我们一家子在山上是咋过来的，你们晓得不晓得！他们把我们这一家人逼到了啥份上，没水喝，没菜吃，连东西也不让买。我们进一回乡里里又有多难！没公共车，他们的车又不让我们坐。我们娘儿俩进了村，连他们的小孩也指着我们骂，拿石头朝我们头上砸。一天就是干馍馍，加饮料。一家人的嘴上都是泡！他们恨他，恨我们这一家子，最后把他打成那样儿，为啥？还不是为了那山上的木头！还不是为了拿公家的东西给自个发财！我家男人是人不是鬼！要是成了鬼，这会儿还能躺在医院里？那也早成了万元户啦，早成了模范啦，早让你们给表扬上啦！那他们还会这样恨他？你们都说说他，他这到底是图了啥啦！”桃花越说越凶，越骂越狠。